

東晉時期敦煌高僧的南巡及遊歷於敦煌的僧人

杜斗成

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敦煌自兩晉以來，即高僧輩出，史稱「敦煌菩薩」的竺法護即是其中之一。其弟子竺法乘，又在敦煌建寺延學，影響很大。關於這些前人多已論及。這裏要提到的還有幾位早期的敦煌高僧和遊歷於敦煌的外地高僧及其有關事迹，以說明敦煌地區在中國早期佛教史中的地位。

前已提及，早在西晉時，敦煌即有高僧竺法護。其弟子竺法乘，又在敦煌建寺延學，傳播佛教。稍後，敦煌高僧輩出，僧傳屢見。

據《高僧傳》卷四〈于道邃傳〉載：

于道邃，敦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妨，為大法樑棟矣。後與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歷名山。為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郝超圖寫其形，支遁著銘，贊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郎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饑，邃有清冷之譽，何得為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這裏我們先看〈于道邃傳〉中涉及的幾位人物。

「蘭公」，為于道邃之師。《高僧傳》中蘭公很多，有竺法蘭、竺叔蘭、于法蘭等，但這裏說的蘭公應為後者。《高僧傳》卷四〈于法蘭傳〉謂其：「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同卷〈于道邃傳〉又謂邃：「後隨蘭適西域」，故此「蘭公」為于法蘭甚明。據《高僧傳》卷四載，于法蘭為高陰人氏，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為業，研諷經典，「道振三河，各流

四遠。」後至江東剡縣（今浙江剡縣）居石城山。孫綽〈道賢論〉以其比「竹林七賢」之阮嗣宗。由此可知，于道邃出家即遇名師。

「護公」，即竺法護無疑。竺法護世居敦煌，其對敦煌人于道邃更應熟悉。竺法護「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妨，爲大法樑棟矣！」可見他對這位同鄉的評價是很高的。

謝慶緒，名敷，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東晉世族名流，事詳見《晉書》卷 94〈隱逸傳〉。

郗超，字景興，東晉太尉郗鑒長子。史言其「善談論，義理精微。」事天師道，又奉佛好施等。事詳見《晉書》卷 67〈郗超傳〉。

支遁，東晉高僧，字道林，世稱「支公」或「林公」。事詳見《高僧傳》卷一。

孫綽，東晉官僚貴族，史言其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晉書》卷 56 有傳。著《道賢論》以「竹林七賢」喻時七高僧。

從上述人物對於道邃的推崇來看，其在當時的影響確實是很大的。南方士族文人，尚玄談空，以清高爲務，于道邃既善方藥，又美書札，尤巧談論，高簡雅素，性樂山澤，正於此世風合拍。透過此點，也可看出這位「高僧」的一些特點，其能在盛行清談的南方士族文人中享有盛譽，其原因大概也在於此。

《高僧傳》卷九〈單道開傳〉又載：

單道開，姓孟，敦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啖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溫夏涼，晝夜不臥。與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到。山樹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石）虎云：「有仙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敕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奏開，初止鄴城西法林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許。於上編管爲禪室，如十斛蘿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咨問，開都不答。乃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

《高僧傳》還說單道開能治眼病，「觀國興衰」等，連當時事石虎的神僧佛圖澄也對其極為賞識。石虎太元元年，開與弟子又南渡許昌，晉升平三年，又達建業。不久又入南海，在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後以百餘之齡，卒於羅浮山，屍置石穴。據說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還見單道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袁宏看後，為其作贊等等。

從上可見，單道開又是另外一種類型的敦煌高僧。他東出南下的時間及路線在其傳記中記載得較為清楚。「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是說他在東晉穆帝承和二年（346年）時從今青海西寧一帶東出。「至南安」，是說其東出時到過古代的南安郡，即今甘肅隴西縣境。後至石趙都鄴城，又徙臨漳昭德寺。石虎太寧元年（349年）又與弟子南下至許昌。東晉升平三年（359年）到建業。不久再南下入南海之羅浮山，即今廣東羅浮山。

單道開為敦煌人，經西平開始南下，所經路線正是魏晉以來一時興盛的「青海道」。

從《高僧傳》所記內容來看，單道開重苦行習禪，兼有神異功能之類，其所修習，與前文中提到的深通佛典，善於論辯的于道邃是不同的。其之所習，不合南朝風尚，因此，其傳中未有南朝士人與他交遊的記載。但慧皎《高僧傳》列單道開為「神異篇」，記其事又極為具體詳細，可見其在當時的南朝也是有相當影響的。

《高僧傳》卷十一〈竺曇猷傳〉又載：

竺曇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後移至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岩獨立，秀出千雲。猷搏石作梯，升岩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峰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岩與天臺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臺懸崖峻峙，峰巔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到者居之。」雖有石

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以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渡，卻後十年，自當來也。」……猷乃退還，猷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幘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忤。」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宅已移，請留令住。」猷留少時，猷每恨不得渡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渡橋少許，睹精舍神僧，累如前所說……猷以（晉）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岩，故見猷屍不朽。……

《高僧傳》中有關敦煌高僧竺曇猷的這段記載，頗具「神話」色彩，但如透過現象，就可發現很多有趣的問題。例如：竺曇猷在赤城山（在今浙江台州市）時和山神及「著單衣幘」人的兩段對話，實際上反映了「遠來」的佛教高僧始入此山時，與中國傳統的道教爭地盤的問題。原「山神」自稱自己是夏帝之子，居赤城山二千餘年，可見赤城山原為道教所佔名山，後此山神「尋還山陰廟」。山陰即會稽（今浙江紹興），此地今仍有大禹陵、大禹廟，自古相傳大禹（夏帝）曾會諸侯於此地。關於竺曇猷至天臺瀑布，過跨澗石橋之事，看來也並非「神話」，此「石橋」今稱「石梁飛瀑」，為天臺山一景。石橋跨澗，橋下飛瀑，至今猶存。竺曇猷在赤城山時，以坐禪為業，禪學造者十有餘人，連王羲之這樣的名士都聞而故往，致敬而返。可見這位河西高僧在當時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此西晉以來，敦煌已成為僧侶嚮往之地，佛教文化一時興盛，故高僧輩出。同時，也有外地高僧慕名往敦煌者。

下面首先要提到的是遊歷於敦煌的樂僔、法良二僧。

關於樂僔、法良二位僧人的名字，見於敦煌所藏〈李懷讓修莫高窟佛龕碑〉等。據陳萬里《西行日記》所載，1925年其赴敦煌時，在「146窟（今編號332窟）內得見李君碑。碑於民國十年時為居留俄人所斷，已折為二。」現此石僅存殘石一方，存敦煌研究院。此碑錄文最早見於徐松《西域水道記》。其後羅振玉《西陲石刻錄》、張維《隴右金石錄》等亦錄其文，但均有疏漏。北京大學圖書館、敦煌縣文化館及敦煌研究院均存有字數不等的該碑拓片。王重民先生根據P.2251號卷子，參照徐、羅錄文，加以校訂，補缺，

已得該碑原文之大概。敦煌研究院李永寧先生又重新校定，並加標點釋文於後，現為此碑最完整的錄文。¹據李承寧先生考證，此碑原立於李懷讓所修之 332 窟。據碑載此窟完成於武則天聖曆元年（西元 698 年）五月十四日，故此碑的所立時間不會距其窟完成時間相去太遠。此碑所記內容甚多，這裏需要提出的就是上文已經提到是樂傳、法良二位僧人。因為這兩位僧人，與河西著名石窟——莫高窟的開創有著密切的關係。其碑陽第 13 行開始載有「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傳，戒行清虛，執心恬淨，嘗杖錫林野，行止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於傳師龕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於二僧。」與此同時，敦煌卷子 P.3720 及莫高窟 156 前北壁墨書《莫高窟記》，也有類似的記載，唯其記年或云「前秦建元之世」，或云「前秦建元中」。但前秦建元年間建窟的記載都較一致。實際情況是，前秦建元之世，敦煌為前涼張天錫所轄，並非前秦領地，但以上材料均用了前秦年號，這樣就引起了人們對樂傳於建元之世在莫高窟建窟的懷疑。對此李永寧先生有兩點解釋：一為西元 366 年，敦煌雖未入前秦疆土，但由於樂傳和尚是「西遊至此」，則可能來自前秦，故其建窟仍用前秦紀年，數百年後的《莫高窟記》等仍沿襲樂傳當時所用的年號。二為封建文人，均以據中原者為正統，而前涼張氏，偏踞西北一隅，在封建文人眼中，自然與前秦不可同日而語，故採用正統王朝年號記事亦有可能。李先生的解釋可通。

前秦之世，長安佛教大盛，高僧雲集，譯講並出。地處河西的前涼張氏在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更加乞憐於佛教，這從張天錫時所譯佛經等情況均可得知。²秦、涼雖為敵國，但共崇佛教，經由「絲綢之路」的中西僧侶仍然很多。故〈李懷讓修莫高窟佛龕碑〉記樂傳「西遊至此」及法良「從東屆此」是完全有可能的。此碑記樂傳、法良事雖極簡略，但卻明確的指出了其二人是從東方來莫高窟的僧人。由此看來，河西早期佛教，在受西域強烈影響的同時，亦受到了內地的影響。

總之，無論從敦煌高僧的南巡，還是外地僧人的西來，皆可說明兩晉時期的敦煌，已成僧人雲集嚮往之地。故莫高窟在十六國時期開鑿並非偶然之事。特別是敦煌僧人南巡遠至浙江天臺、廣東羅浮等名山，更值得進一步研

¹ 詳見李永寧：〈敦煌莫高窟碑石文錄及其有關問題（一）〉載《敦煌研究》（敦煌）總第 1 期。

² 據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七〈首楞嚴後記〉載：前涼時期即翻譯過《首楞嚴》、《須賴》、《上金光》、《如幻三昧》等經。

究。

